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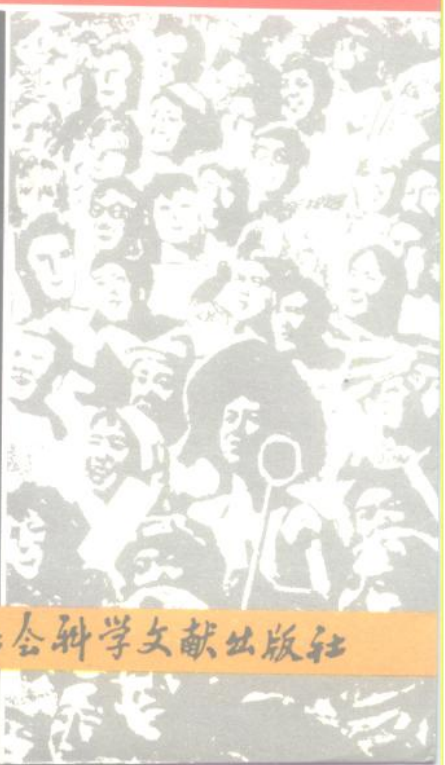
[美] 莫里斯·梅斯纳 著

张 璞 等译



#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美]莫里斯·梅斯纳著

张 瑛 等译

丘 成 等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 028 号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6

---

根据美国纽约自由出版社 1986 年版本译出

2013/27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美]莫里斯·梅斯纳著

张瑛等译 丘成等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门头沟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7.75 印张 459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一版 199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80050-241-4/D.49 定 价: 8.80 元

**(内部发行)**

## 译者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诞生以来，其发展的历程及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当代举世瞩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不仅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国际学术论坛特别是中国学家们关注的中心之一。在近年来欧、美的中国学著述中，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因其在资料和立论上的某些独到之处而受到人们注意。在西方国家中，许多人誉之为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之一。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材料丰富，涉及面广，并且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写中国现代史，用比较历史研究法剖析、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用梅斯纳自己的话说，本书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评价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逝世后的时代，都力求“在合理的范围内公正地衡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和失败”。这种做法在西方历史学家中并不多见。

当然，梅斯纳远在太平洋彼岸，我国这几十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并未亲临其境。因此，他的记叙难免有不够确切的地方。

其次，不言而喻，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本书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立论偏颇或失当之处，而且没有摆脱西方学术著作中某些常有的成见。我们翻译此书，把它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和研究人员参考，着重的是它的文献价值，而并不表明我们赞同作者的观点、评语和结论。作者自己在增订版序言中也声

明：在论述中国当前局势的最后一章中，他对事件的解释“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暂定的”。可见，他也预料有些读者可能认为他的论据和论断并不具有说服力。但是，我国的读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从本书中了解西方学者掌握哪些资料、运用什么观点来撰写我国现代历史，从而开阔视野，从多方位、多角度来审视我国这几十年的过去。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和研究人员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采取冷静的分析和批判态度来阅读此书的。

本书是詹姆斯·E·舍利丹 (James E·Sheridan) 主编的《现代中国变化丛书》之一。作者梅斯纳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历史学教授。除本书外，他还著有《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已有中译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等。

本书译文略有删节。参加翻译的有：张瑛 (第1-4及22-23章)、程小楠 (5-6章)、张殿华 (7章)、马瑾 (8-10章)、郑博文 (11章及14章一部分)、曲毓琦 (12章)、侯亦男 (13章及14章一部分)、赵伯英 (15-18章)、来鲁宁 (19-21章)；校对者为：丘成 (第1-6、8、11、13-14章)、赵伯英 (7、9-10、19-21章)、来鲁宁 (15-18章) 和郑博文 (12章)。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译者

1991年秋，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 序 言

卡尔·马克思对历史上的矛盾现象具有兴趣。1850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一个世纪，他曾经作过一次富于想象力的小小猜想：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 华 共 和 国  
自由、平等、博爱。”<sup>①</sup>

今天飞往中国的西方人士数目日益增加——并且是乘坐喷气式飞机——他们现在发现在中国的墙壁上写着的，不仅有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激进的民主口号，而且有卡尔·马克思的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口号。在马克思时代曾经以“天朝”闻名于世的国度，即马克思（在他对矛盾现象不那么感兴趣时）称之为“活化石”的国度，目前不仅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人们在它的大门上总会发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谁也未能预料到（卡尔·马克思也一定未曾预料到）：“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学说，会在“落后的”亚洲中最古老的国度

---

<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265页。

里深深地扎根。

历史学家一直长期思考这一矛盾现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毕竟是个认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条件的假设。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创造出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历史可能性的工业先决条件——而且同时产生现代无产阶级，即注定要使那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前的中国，马克思的当代弟子们却完成了现代最伟大的革命，并且是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完成的。

当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生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他们原来的预期完全相反）不久就被迫将他们的革命努力局限于一国之中，这个国家当时主要缺乏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和社会的先决条件。那些努力的社会后果现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给那些为人类设想社会主义未来的人提供多少安慰，甚至更少鼓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落后得多的国度里，通过不同的革命途径于 30 年后掌握政权——而且他们在过去的 25 年间已经开辟了一条新的革命后道路，其最终社会后果，人们目前还无从预料。本书就是一部叙述要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特尝试的历史。

当毛泽东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那个时代就正式开始了。虽然那一天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但是那次开国盛典在历史上却是高潮的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农民士兵们在新国家正式宣告成立以前好几个月就已经迈进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准备在那里接受那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几乎没有起过作用的城市居民的欢迎。那场革命的决定性战斗，早已经在远离中国古代首都和现代城市的广大农村腹地展开了。夺取城市和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时间上并不象那场历史上独特的、经历 20 多年艰苦岁月去完成军

事、政治任务的革命内战那么漫长。对那场革命至关重要的英勇时代属于过去，而1949年的胜利者们还完全无法逆料的革命新剧则有待开始。

但是，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如果说革命涉及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10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sup>①</sup>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发展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而且，在10月1日所尊崇的正是这个革命性摧毁和创造的先期进程。在超过25年的期间，每年的这一天，中国领导人都站在那同一座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

---

<sup>①</sup> 美国著名记者、社会主义者约翰·李德（John Reed，1887--1920）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写了《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1919年出版），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介绍那场革命的一些动人情景。——译者注



日，即“新中国”诞生的正式周年纪念日。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与那个正式节日同时开始。尽管革命产生新的社会，可是革命并非从无中产生。虽然毛泽东曾经宣称中国是一张“白”纸，献身的人们可以随意在这张白纸上写任何革命的新词句，但是历史的石板却并不那么容易擦得很干净。因为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中国弟子宣布“一穷二白”这一革命美德的一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相是：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①</sup>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遗留和传递下来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经历的产物。中国的新秩序并不象那句曾流行的（但是令人产生很大误解的）词句“共产党的接管”所可能暗示的那样，于1949年突然以充分成熟的形态从米涅瓦<sup>②</sup>的脑袋里出现。而且，那些准备并且实现了那场革命的人们也并不是外来人；他们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国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要了解他们在1949年后创造的历史，我们有必要了解产生他们的历史环境的某些情况。

因此，本书的第一编一般地探讨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的中国历史环境，并且叙述他们所遇到并且加以改造的历史环境。第二至第五编试图讲述并且评估自毛泽东于1949年宣布新中国诞生至1976年9月9日他逝世时为止的、目前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

我的目的并不是把这段历史作为对“现代化”进程的个案研究来加以讨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们的目标是使中国既是现代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所写的各章中，我宁愿按照中国

---

① 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603页。

② 米涅瓦是罗马神话中司智慧、学问、战争等的女神。——译者注

共产党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的观点来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推进现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有一个足够高而强有力的判断标准去评估他们的成败。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痛感写当代史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越靠近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革命时代，就越难以认识其重要的特点。今天看来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明天看来可能是无意义的。而且，在试图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既因为材料过多又因为材料缺乏而感到苦恼。我只希望：我没有把历史上重要的东西遗漏过多，或者把那些最终将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包括太多。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许多研究和撰写现代中国史的学者们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本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中仅仅开列他们的著作，这当然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我确信他们将会原谅我运用他们的著作来作出他们可能不赞同的解释。

我特别感激詹姆斯·谢里登、西尔维亚·格拉戈夫、罗伯特·马克斯、林恩·鲁普克曼、霍华德·特明和罗兰·梅斯纳通读本书原稿，并且提供大量深刻的批评和意见。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回答他们和其他人所提出的全部问题。我十分感谢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历史系的教职员以各种形式向我提供的帮助。我还特别感激塞西尔·亨内曼、海伦·赫尔和卡里·麻克斯，他们慷慨地为我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 增订版序言

《毛泽东的中国》的初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写作，手稿于1976年夏季完成，那时距毛泽东逝世仅仅几个星期。因为自由出版社正在编辑本手稿，准备于1977年出版，所以本书作者就比较匆忙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逝世这一事实以及这一事件<sup>①</sup>的直接政治后果简略地补写进最后的手稿之中。

尽管毛泽东和关于毛泽东的神话支配了中国革命后最初25年历史中的<sup>②</sup>那么大的部分，但是，我在写本书初版的最后篇章时，却没有充分认识到那位主席离开中国历史以及他进入“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两件事情的意义。毛泽东的逝世终于成为中国革命全盘非激进化的时机，即使不是这种非激进化的原因；他的逝世解放了在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和受约束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主要是迅速工业化的成果（即使这种工业化是不平衡的）；这些力量的政治表现是中国“新卓越领袖”邓小平的上台。毛泽东逝世后的那些岁月里，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激动人心但有争论的变革。尽管毛泽东后时代的各种政策和改革试验的社会后果还

---

① 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华国锋执政，以及（在1976年10月）逮捕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被贬斥为“四人帮”的人们。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的初版中，作者把华国锋说成是“中国政府的暂时代理人”。华国锋后来作为中国领导人那一段相当平庸的短暂经历，并不使我感到有任何必要去修改上述判断。关于“四人帮”的情况，我在1976年所知甚少。可以指望本增订版首先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

② 原文如此。按自1949年至1976年应是27年。——译者注

无从预见和猜测，但是，迄今所发生的变化，其影响比我在1976年所预料的要大，虽然我怀疑这些变化在目前的许多观察家看来，也许并不具有它们现在所显示的那么多的重要性。但是，不管邓小平时代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已经披露了关于以往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新信息（一部分是有意发表的，一部分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遵循新方针的意外结果），特别是关于北京目前谴责的1966—1976“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新信息。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已经进入毛泽东逝世后时代），关于已故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新线索、新见解，推动我写这个新版本。对论述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第五编，已经作了大量的增订，利用了许多新事实和新学术成果。增加了论述“文化革命的概念”这一章，以便把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不寻常事件放入历史环境和理论氛围之中，使之更容易理解。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叙述（本书的第十九和二十章）已经大量扩充；现在我觉得那场社会大动乱似乎比我在写初版时所感到的，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更复杂的社会内容。对论述毛泽东执政最后几年的第二十一章（前版本的第二十章），我作了特别广泛的增订。在1976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结束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尚不为人所知，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我当时的确知道的一些情况所具有的意义，我也只是模糊地认识，并且经常发生错误。我希望本书的叙述能减少些严重的缺点。因而第五编中讨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部分，与初版所写的内容大不相同，而且不得不费更多的篇幅。我只能请求读者原谅初版的简略。

我为本版撰写了新的第六编，把它作为认识毛泽东逝世后这些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历史趋势的初步尝试。在构成新编的两章中，较短的第一章试图评估毛泽东时代的积极成果和消极后果，以及毛泽东遗留给后继者们的经济、政治诸问题。在最后的第二十二章中，我按照我在1985年中期所知道的那个尚未结束

的变革与试验时代的情况，写了毛泽东逝世后时代的解释性简史。这一章只不过是一篇历史梗概，而且，在这一章中出现的一些解释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暂定的。

必须指出：对叙述文化大革命前时期的几章的修改，曾经受到经济上和时间上的限制。除了改正印刷错误以外，对叙述1966年以前时期的部分，只有两章作了实质性的改动。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十章，因为考虑近年来出现的新学术成果，后半部已经修订。第十四章论述大跃进运动的最后几页已经重写，探讨了那场冒险运动所造成的饥荒。

在尝试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逝世后时期历史的过程中，我一直使用我在初版中运用的同一判断标准。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不管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者，还是谴责“文革十年”的毛泽东逝世后的领导人，我都一直尝试根据他们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观点去观察他们的言行，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通常所偏爱的、关于“现代化”的不十分定形的棱镜去观察他们的言行。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毛泽东主义前辈们一样，都宣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而是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对他们努力的结果就应该以他们的那些标准去衡量。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法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评价当代中国历史，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批评性的、而且也许是令人沮丧的结论。我在《毛泽东的中国》的初版中，正是根据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作出结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逝世后时代，可能以官僚主义的长期存在及其继续君临于社会之上这种现象为标志。尽管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进行了改革，我也

没有理由去修改上述评价（而且的确部分地由于那些改革），即使在过去几年间，我对其他许多问题已经改变了观点。本书初版还下结论说：毛泽东的中国未能符合其领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法。在本版中，我把这一结论也应用于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因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景比10年前甚至更为遥远。另一方面，我也不倾向于接受那些批评或赞扬毛泽东逝世后政权的人们目前所持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新资本主义的黎明即将到来。除非人们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使其广义程度超出所有历史上合理的承认，否则，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都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不大可能成为其中的任何一种社会。我在本书第六编中提出我作出这种也许是含糊的、不确定的结论的理由，读者也许觉得这些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也许觉得并没有说服力。

在本版的一些部分，特别是在后几部分，读者可能察觉出我的一种失望感，也许是一种悲哀的调子。虽然与其说我是预期，倒不如说我总是希望看见一个真正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但是，我的希望在毛泽东政权最后几年和毛泽东逝世后时代逐渐变得渺茫，这一点无疑反映在本书第五和第六编的文字之中。然而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既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和社会成果。正如在所有曾经引起很大期望的社会革命中那样，人们对于那些变成当权者的革命家们的失策和罪过，比对于他们的成就容易觉察得多。不过，我希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主义时代和毛泽东主义后时代，我已经做到在合理的范围内公正地衡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和失败。

我在本书中撰写和修改的内容，大部分来自许多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学者的著作。虽然他们恐怕不大可能赞同我的许多解释，但是我的大多数解释的产生，却必须感谢他们，我

的谢意超过我在本书中援引他们著作时所使用的词句。我特别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们，他们在提供时间、帮助、真知灼见、批评和鼓励方面一直格外慷慨。尤其阿利夫·得尔理克教授、西奥多·汉默洛教授、唐纳德·克莱因教授、卡尔·里斯金教授和詹姆斯·谢里登教授，应该得到我的最特殊的谢意。不过他们（还有其他所有人）对我在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我感谢卡尔·里斯金教授允许我读他那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出色手稿（即将出版）的一些部分。我还最感激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历史系的职员，尤其是感谢凯伦·德尔维契在准备出版本书方面给我以一心一意的慷慨援助。而且，假如没有自由出版社高级编辑乔伊斯·塞尔策创造性的编审工作，拙著本来不大可能问世，我既感谢她的友谊和批评性建议，也感谢她的耐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由于个人和学术方面的理由，我极其感谢我的夫人林恩·鲁普克曼。她对本书手稿的写作，贡献一直是巨大的，尽管拙著本身并非巨著。

我谨将本书献给我的同事和同志哈尔维·戈尔德堡；对多年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灵感和友谊，拙著不过是表示谢意的小小纪念品。

莫里斯·梅斯纳  
1985年秋

# 目 录

序 言 ..... (1)

增订版序言 ..... (1)

## 第一编 革命传统

第一章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 ..... (1)

第二章 知识分子的叛离 ..... (11)

民族主义与对传统观念的抨击 ..... (13)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 ..... (19)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 ..... (23)

1925—1927 年的革命 ..... (27)

第四章 革命的毛泽东主义阶段与延安传统 ..... (35)

长征在政治上与心理上的意义 ..... (37)

延安时代与农民革命 ..... (42)

毛泽东主义的渊源 ..... (47)

延安的马克思主义 ..... (53)

延安的传统 ..... (55)

## 第二编 新秩序(1949—1955 年)

第五章 胜利后的窘境 ..... (63)

第六章 新国家 ..... (73)

领土统一：未完成的任务 ..... (84)

镇压与恐怖 ..... (87)

第七章 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 ..... (96)

建国初期的城市经济 ..... (106)

第八章 土地改革：农村中的资产阶级革命 ..... (114)



	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 .....	(116)
第九章	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后果 .....	(128)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经济落 后与社会主义的观点 .....	(130)
	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与 向社会主义过渡 .....	(133)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性质及其 经济后果 (1953—1957年) .....	(138)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治后果 .....	(143)
	高岗事件 .....	(149)
	肃反运动 .....	(152)
	社会后果 .....	(155)
第十章	农业集体化(1953—1957年) .....	(157)
	新的土地革命 .....	(162)

### 第三编 重振革命精神(1956—1960年)

第十一章	百花: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 .....	(185)
第十二章	不断革命:大跃进运动的思想渊源 .....	(227)
	马克思主义与不断革命思想 .....	(229)
	毛泽东主义与不断革命论 .....	(232)
第十三章	大跃进的经济 .....	(242)
	人口、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问题 .....	(243)
	劳动力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	(246)
	技术革命 .....	(249)
第十四章	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8—1960年) .....	(253)
	农村人民公社的出现 .....	(257)
	第一次退却 .....	(271)
	庐山会议 .....	(274)